

百科史学

晚清 改革与革命

迟云飞◎著



晚清改革与革命

迟云飞◎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改革与革命 / 迟云飞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00-9876-8

I. ①晚… II. ①迟… III. ①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 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6449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李玉莲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093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59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876-8

定 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新政改革与晚清政府再认识·····	1
列强的冲击与清政府的衰亡·····	1
清季政府及其覆亡论析·····	24
晚清社会的裂变与各阶层分析	
——兼论清王朝的覆亡（1901—1911）·····	38
晚清改革与革命的互动·····	56
晚清新政与中国知识人知识体系的转换·····	63
清末谁最早要求设议院？·····	68
重新审视晚清立宪派·····	72
清季主张立宪的官员对宪政的体认·····	80
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	101
端方与清末宪政·····	125
赵尔巽·····	159
载 泽·····	167
善 耆·····	172
载 涛·····	178
载 洵·····	182
晚清预备立宪与司法“独立”·····	184



清季部分官员反立宪思想探略	
——1906—1911年	202
中国第一次“省议会”的试验：晚清谘议局	220
革命再解	226
革命、改良与革命、晚清革命的起因	226
孙中山与晚清革命党人社会背景的再认识	238
黄兴与民初政局	
——以对袁世凯的关系为中心	259
孙中山与宋教仁关系论析	269
宋教仁与社会主义思潮	294
宋教仁的边疆史地研究	
——以《间岛问题》为中心	317
陈天华、宋教仁留日史事新探	337
关于宋教仁研究的几点意见	
——在宋教仁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2011年6月9日)	344

新政改革与晚清政府再认识

列强的冲击与清政府的衰亡^①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

一、问题的提起

近20年来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史学界^②，近十年来在中国史学界，都有一种否定西方人的东来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的倾向。这些学者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仍然按照自己的历史惯性变革和发展，西方人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是一个严肃的当然也是不容易解决和回答的问题。笔者以为，把冲击—反应的

^① 列强对近代中国的冲击是多层面的，本文一般就军事冲击即列强的军事侵略及不平等条约的冲击而展开探讨，对于文化的等更复杂的冲击暂不多涉及。

^② 参见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



模式像标准公式一样到处套用固然不合适，但显然抛开西方的影响，是无法谈中国近代史的，就如同抛开中国传统的影响也不能谈中国近代史一样。

换一个角度，工业革命之后，当火车轮船的通行、电报电话的应用将世界逐渐连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各个国家特别是落后的国家还能否完全或主要按照自己国家原有的运行轨道继续发展？我认为，不能。

那么，列强的到来究竟怎样影响了中国，影响到什么程度？这种影响又与中国原来的历史轨迹怎样交互起作用？这是历史学界需要花大气力去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不是全面解决这个难点，而是试图通过对清王朝灭亡的探讨，从一个侧面讨论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1840年以来列强的侵略和冲击，以及这种侵略和冲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变化，大大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速度，从而使其在1912年初宣告退出历史舞台。如果没有列强的侵略，清朝的统治可能会延续更长的时间。

二、两次鸦片战争，衰征初现

我们首先简单讨论鸦片战争前的清朝。

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相对于同样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朝来说，它的统治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所以武力强大的元朝统治全中国的时间不到一百年，而清代仅从入关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就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①的确，1840年以前，中国已面临一定程度的社会危机，清王朝也已经从康、雍、乾鼎盛时期跌落了下来。但是，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从它

^① 清朝初建时武力自然也是十分强盛，但比之几乎征服整个亚洲及部分欧洲的蒙古帝国，毕竟逊色得多。



走下坡路到灭亡，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清朝统治相对稳固的原因不仅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更重要的是经过上百年的磨合，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士大夫已经认同清朝的统治^①。在这些士大夫的眼里，大清王朝和历史上的汉唐宋明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社会精英认同清朝统治，一定程度补偿了清朝武力下降对它的统治的影响。嘉庆白莲教造反曾给清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白莲教对清王朝的打击，比不上黄巾造反之于东汉，比不上安史之乱之于唐朝，也比不上后来的太平天国对清朝的打击。嘉庆之后进入道光朝，除了西北的张格尔叛乱外，好像又是一个四海承平的时代。

然而，1840年，也是道光皇帝执政20年之时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揭开了清王朝加速衰落的序幕。

众所周知，在断断续续的两年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军队几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甚至像样的势均力敌伤亡相当的仗都没有打过，道光帝只好以屈辱的和约结束了战争。不能完全说清政府不努力，至少不能说所有的官员都不努力，因为在战争过程中，阵亡的和殉国的官员就有一位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两位提督、三位总兵，一位副都统，一位副将。比较差不多一百年后的八年抗战，中国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军官是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抵不上级别相当于今日政治局委员的两江总督裕谦。清朝以强盛的武力建朝立国，这样的失败是空前的，甚至道光帝都觉得脸面丢尽。以致他留下遗嘱，不准他的儿孙在他的墓地造像他的祖辈墓地那样的“圣神功德碑”。然而外患并没有到此为止，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到20年，就在清王朝与太平天国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英法联军又发动了战争，并且占

^① “曾胡左李”为首的湘军、淮军崛起并维护清朝统治，便可以说是士大夫拥护清朝的一个见证。



领了首都北京，这不仅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而且延缓了它对太平天国及其他造反者的镇压。

战争首先暴露的是清王朝的军事体制问题。

众所周知，近代以前，清王朝的基本武力是八旗和绿营。满清初入关时，八旗兵铁骑曾横行天下，几无敌手。但是，随着和平年代的延续，八旗兵已经完全失去了其祖先的赫赫威风。由于清政府长期不让满族人民从事生产劳动，满族青壮不仅不能打仗，甚至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能力都渐渐丧失。到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八旗兵已经完全成了不中用的摆设^①。

在清朝的历史上，绿营兵在征讨西北等地的叛乱中，也曾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到道光时绿营兵也与八旗兵一样不堪一战。

军队缺乏战斗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种是武器方面的，即面临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主要用热兵器装备的部队，八旗绿营的基本装备是冷兵器^②。另一种更严重的是体制方面的。绿营兵驻地极为分散，相当多的士兵承担警察职能甚至各种各样的杂务；官不熟悉兵，兵不熟悉官；基本上不进行军事训练；临到战争，军队从各处零散抽调拼凑而来，最高指挥官不知道哪部分军队善攻，哪部分军队善守，哪部分军队战斗力强，哪部分军队战斗力弱，所以只能是凭感觉、瞎指挥。败不相救，胜则争功。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清朝的军队是用于弹压国内动乱的，几乎没有对外的功能，它不是真正的近代常备军^③。其实不仅清朝如此，在没有“边患”的历朝历代莫不如此，

① 八旗兵失去战斗力有许多原因，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不准满族人民从事生产从而使满族人民整体衰落。

② 中国军队装备有部分火器，但比之用现代工业制造的枪炮，相差甚远。

③ 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8—58页。



这是为防止军人威胁中央统治而采取的措施，可以说是君主专制与生俱来的痼疾。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仅就军事上来讲，有多方面的原因，直至今日，一般人甚至许多学者也只注意英军的船坚炮利，也就是武器和技术的差距；注意某些官员和皇帝的无能以及妥协方针，而忽视中国军队体制方面和战略战术思想方面的原因。随着以后的历史变幻，清朝军队体制的问题使它吃尽了苦头。因为按照绿营的体制，对付小规模的反、骚乱和土匪确实实用甚至很有效，但是对付强大的外敌却全然不行，甚至对付组织坚强、战斗力也强如太平天国这样的造反者，也会完全失灵。

无论是应付内乱还是外患，清政府非改变军事体制不可，否则就会灭亡。

就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创办了湘军。他用儒生为将，以乡农为兵，成为一支与绿营完全不同的军队。虽说湘军的体制造成了军队中的私人隶属关系，但毕竟给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湘军、从湘军中分离出来的淮军就成为清政府真正的正规军。而军队体制的改变，说明清王朝还有一定更新能力。不过，湘军也好、淮军也好，都还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特别是体制问题，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

两次鸦片战争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

一个政府的生存，必须有良好的财政，保证它的日常开支，同时在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支出时，财政体制能够提供支持。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财政能够正常维持。有学者研究，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除却个别战争时段外，户部常有积存，最高年份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白银 8000 多万



两。嘉庆以后由于镇压白莲教造反，库存下降，但到道光前期，每年平均库存仍有 2000 余万两。道光三十九年（1859）一年财政节余达 1000 万两^①。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财政开始困难；一个是随着太平天国造反而导致财权下移，中央政府对财政的控制能力大大降低。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战费、赔款等费用，立即使财政捉襟见肘。鸦片战争清政府战争开支约 2500 万两，民间捐输 500 万两^②，赔款 2100 万元约合银 1470 万两，总计约 4500 万两。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一年的财政收入（约三四千万两），对清政府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九年中，只有一年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有财政盈余，其他年份均为赤字，总赤字达 1000 万两，而户部的库存只有 100 余万两^③。

由于这种情形，太平天国爆发以后，清政府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并使清政府对太平天国的镇压能力大大降低。地方官员们想出了征收厘金的办法，总算勉强承担起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要的军费。

太平天国造反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国内自身社会矛盾的积累，还是鸦片战争及其结果的冲击造成的，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讨论。但正如前文所说，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延缓了清政府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如果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无法兼顾，太平天国的灭亡至少不会拖到 1864

①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9—41 页。

②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 420—421 页。

③ 《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 67、71 页。



年，那样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

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严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威望；沙俄趁机蚕食中国的领土，也使清政府的威望受损。这些都不是致命的，但却是个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列强侵略的深入，这些事情对清政府的损害就会逐渐显现。

三、改革迟滞，种覆亡之因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所表明的，决不仅仅是大清朝君臣的无能，不仅仅是官员和军人不努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现有的传统的体制适应不了新的形势。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君主专制制度。也有人换个角度称之为大一统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全国好比一个大家族，君主就是这个家族的家长，全家族的人供养君主，君主负责家族的安全与稳定。所以政治理论追求的是和谐、稳定、安居乐业而不是发展和竞争。当然，这也与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高于周边民族，体制上中原王朝没有竞争者（武力上有竞争）有关。政府中的政治权力虽然相当集中，但这种体制的社会动员能力却又非常之低，当严重的外患发生时，它不能发动全社会成员来应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的是全新的世界格局，一个争强争胜激烈角逐的世界格局。李鸿章多次强调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部分表达了对这种格局的认识。这种格局，要求中国特别是领导中国的政府做出较大的调整和改革，才能适应这种格局。

做出什么调整呢？

今天看来，要求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立即做出较大

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即人们常说的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立宪君主制，是不可能、不现实的。而且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政治的民主化未必立即导致经济的迅速发展^①。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史学界常常指责洋务运动时清政府（或洋务派）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在是强人所难。事实上，还没有哪个非西方的国家一接触西方就有如此大力度的改革。即便是对外界的反应极为灵活，善于变通、学习和效仿的日本也是1868年（黑船事件之后的15年）才开始较全面的现代化计划，又过了20多年才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日本真正实现了民主宪政，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但是，在当时严酷的国际环境下，却有两件事情必须做：

第一，改变政府的职能。

第二，改变固定的、僵化的思维，或思想。

先说第一条。按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政府的功用只是求得全国局势的稳定与和谐，百姓安居乐业，最好是“人人平均，人人饱暖”。反过来，百姓对现存政权给予支持，或至少是默认。这样就可以保证皇权的稳固，当然间接也是保证社会的稳定。至于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不是传统范围内的发展），与别的国家进行经济的以至全面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以求得国家的生存和进步，基本上与政府无关。就这一点来说，传统的政府实是处在一种“无为”的状态。

但是，鸦片战争后列强的进逼，要求中国的政府改变过去那种不作为的做法，将只是求稳定和谐和政府体制改为进取竞争、能够促进迅速现代化的体制。或者说，要由政府领导进行迅速有效的现代化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不受列强的欺

^① 笔者相信，比较专制制度，民主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那是较长时间过程的事情，而不一定立竿见影。



辱和侵略，保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换一个思维角度看，列强带给清政府的绝不仅是冲击，还有机会。如果把握好这个机会，成功使中国现代化，便可能避免中国自古以来的一治一乱、朝代更替的循环，也可解决传统农业经济水平之下无法解决的人口膨胀带来的社会问题。

前面说过，我们不能指望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就改革政治体制，因为那是苛求前人。但是，今天我们作事后诸葛亮式的探讨和评论，有些事情清政府是可以做的，也是应该做的，甚至是必须做的：

1. 建立现代国防军。使军队体制现代化，改变军官的成分，学习和掌握现代军事理论和思想、战略战术，而不仅仅单纯应用新式枪炮轮船和练一点洋操。

2. 全面经济现代化的计划。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同时在某些必需的行业发展国营企业，建立现代银行系统，建立现代交通体系。

3. 发展现代教育，建立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自己的科技体系，在国内暂时还不能培养高级人才时，可以视财力派留学生。

4. 对政府机构作适当的调整，设立新形势所需要的新机构，废去无用的旧衙门，废去冗官冗员。提拔了解世界大势、有新知识又勇于任事的人充实官员队伍。

这些事情并不是要在一两年做完，而是可以在三四十年里逐步做好。这些改革都不会直接触动皇权，而且如果做好了，在短时间内对维持皇权甚至会有很大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这些事情也是难以做到的，提出来是否也是苛求前人。我认为，要真的想图强御侮，真的使中国能够在当时弱肉强食的世界立足，这些事情都是必须做的，就像明治维新的日本。因

为严酷的国际环境不允许政府只作点滴的改良，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

再说第二条，要作上述的幅度比较大的改革，需要改变传统思维。这需要克服以往的夜郎自大和天朝上国意识、文化优越意识，克服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的陈腐观念，克服以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惰性心理。甚至需要改变科举制笼罩下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即由以往的传统经典为主体的旧知识体系转向以现代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为核心的现代知识体系。

但是清政府是怎样做的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好像一切危机都已经过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以及清王朝来说，又是一片歌舞升平的世界，几乎所有的人仍沉浸于天朝上国的旧梦中，很少人认真总结战败的教训，认真研究西方列强，研究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有了京师被占，圆明园被烧的惨痛经历，才有部分人开始寻求学习西方的某些方面以图能够抗衡列强，这就是所谓的自强新政，也就是大陆史学家常称的洋务运动。30年的自强运动，并没有真正达到“自强”目标，究其原因，还是清政府的现代化改革是局部的、片面的、随意的。试看笔者前列的四条清政府是怎样做的：

1. 自强新政期间的军事改革基本上只限于应用新式武器和新式操法，军队的体制、军官的构成、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都没有多少变化。要知道，一支仍然是传统体制、军官完全不懂近代战争的军队，即便拥有了新式武器，人人都练成神枪手，仍然是乌合之众。而军队完全仿效西方现代化是1901年以后才努力实行的。

2. 鼓励私营企业是甲午战后才开始的，而真正实施是在



1901 年以后的新政中；中国第一家银行，迟至 1897 年才开办，而那时日本已有上千家银行；而真正算得上现代银行系统，有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才实现的；现代交通，只有轮船航运是在 1872 年创办起来，至于铁路，甲午战争前只有 300 多公里，而日本 1890 年就达 2733 公里，1896 年达 4031 公里，中国尚不及日本的零头。至于全面的经济现代化的计划，恐怕 1927 年以后的国民政府时期才谈得上。

3. 现代教育体系也是晚清新政期间建立的，派留学生也是如此，这都比日本晚了几十年。

4. 机构改革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没有实现，比较大的改革迟到晚清新政期间才实施。

如果是在平和的国际环境中，本可以从容改革；如果没有列强压境，不改革也许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但现实是严酷的：清政府领导不好中国，中国就会不要它。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20 年是个机会，错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又是一次机会，清政府没有好好利用；甲午战争后是最后一次还算好的机会，清政府又没有把握好。结果，改革的迟滞，眼光的狭隘，使清政府败于甲午战争，败于庚子战争，随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束手无策——它已经无力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更不用说尊严。而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后，清政府成功改革的空间就不大了。随后便是失去对中国的统治。

除非中国永远不兴起现代民族主义，或者分崩离析而被列强瓜分，或像印度一样沦为某一国的殖民地，一旦中国兴起民族主义，试图摆脱列强的控制和受欺辱的局面，其矛头必然指向无能的、没有有效抵御列强侵略的政府。

晚清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倾诉，直接道出了 20 世纪初新



知识青年人的不满和革命的起因：

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满洲政府不早变法。你看洋人这么样强，这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美各国，如今单说那日本国，三十年前，没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初年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到了如今，不但没有瓜分之祸，并且还要来瓜分我中国哩！论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他因为能够变法，尚能如此强。倘若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变起法来，莫说是小小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国恐怕也要推中国做盟主了。可恨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到了戊戌年才有新机，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维新的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全不管汉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的光明，那黑暗倒反加了几倍。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①。

上帝是公平的，他给了清政府很多机会，但上帝并不偏爱，对于不会利用机会的人，或者说不会利用机会的政府，上帝最终会收回机会。所以，清政府改革的迟滞，不但是失去了使中国转弱为强的机会，也是失去了延续它的统治的机会。

^①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